

论高校古典文学教学的误区

谢 谦

(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我国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在计划经济时代沿袭前苏联教学模式,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与理论的阐释,而轻视学生文化底蕴和实用技能的培养,形成假大空的教风和学风,与现代社会对中文人才的实际要求严重脱节,应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以及培养目标诸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古典文学;教育;综合素质;实用技能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6-0035-05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主干课程,甚至曾经被视为中文系学生的看家本领。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门课程失去兴趣,只是由于教学计划的安排,为了应付考试,完成学分,才心不在焉地坐在教室。在一些中文系毕业生回顾大学生活的文学作品如周昌义的小说《永别了,大学》、俞杉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李亚伟的诗歌《中文系》中,古典文学的教学竟被作为嘲笑调侃的对象,而且在中文系历届的学生中引起广泛的共鸣。不少学生甚至对这门课程存在的价值都发生了怀疑,在一次学生座谈会上,曾经有人质疑:“我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学习古典文学,究竟有何用处?”这也许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高校教师,可以举出一大堆事例,如鲁迅、郭沫若等大文豪古典文学功底如何深厚,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如何得益于古典文学等等,来证明学习古典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因为我们高校的中文系

至今没有培养出鲁迅、郭沫若那样的文豪,而许多在当代文坛甚有影响的作家诗人并非中文系科班出身。但这不能怪中文系。中文系培养作家或诗人,这是对中文系最大的误解。文豪作家不可能由中文系批量生产,中文系能够批量生产的是社会各界需要的高级文才。这不是贬低中文系的培养目标,而是给予其准确定位。尤其在高等教育日渐普及、市场经济席卷中国的今天,大多数学生之所以争过高考独木桥,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无非是学得安身立命的生存本领,然后才求发展。我们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中文这样的人文专业教育,理应将素质培养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既务虚又务实,教给学生能够谋生存求发展的实用技能。这样来反思我国高校古典文学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就会发现问题不在学生厌学,而在我国高校的古典文学甚至整个中文学科严重脱离现实,陷入重重误区。

误区之一:文学讲成文学史或理论课。众所

周知,建国以来的文科教学,引进前苏联的教学模式,将意识形态的灌输放在首位,强调理论的指导意义,故而高校的古典文学课程几乎都变成了清一色的文学史,甚至是“以论代史”。既然是“史”或“论”,所讲就多是诸如作家地位、艺术成就、时代思潮、发展规律之类的“宏大叙事”,既高屋建瓴,且理论性强。这种特点在文革前的统编教材中尤其明显。古典文学的教学内容多集中在给作家定位,给作品定性,这样主义那样阶级,然后归纳出几条结论。甚至所谓艺术分析,也是套用苏式文艺理论的教条,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等等。20世纪50年代,不少学养深厚、才气横溢的老先生不知所措,尴尬已极。例如精通诗词格律且能写一手好诗的古典文学专家启功先生当年就曾遭遇这种尴尬。因为他还未曾学会如何对唐诗宋词进行阶级分析或思想分析,他在30年后还念念不忘“我教唐诗的失败”,道尽了老一代古典文学教育家的苦衷。而一批初出茅庐的后生尽管根底甚浅,不知诗词格律为何物,但仅凭他们的理论武器,就统治了古典文学的殿堂。李希凡、蓝翎轻而易举批倒红学专家俞平伯,由此而影响到整个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古典文学不讲艺术,而讲所谓思想理论,屈原、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曹雪芹这些文章大家都被当成阶级分析的解剖对象,古典文学就这样变成了证明阐释某种理论或主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观念发生变化,极左思潮的理论理所当然被摒弃,但许多高校古典文学的教学模式依然如故,无非是引进了一些时髦的西方文学理论。一位教师讲《春江花月夜》居然分析出二十四种不同的“美”,真令人佩服其想象力。而某些教学管理机构在评估古典文学的教学质量时,依然将所谓“理论性”放在首要地位。这种教学模式的流弊就是假大空,不少学生除了满脑袋似是而非的主义,条条款款,空空如也。

误区之二:文学解读与能力培养严重脱节。古典文学课当然也讲解分析作品,引导学生阅读名篇名著,内容是与《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关键在于,对作品的解读与能力培养严重脱节。中文系学生写作水平的普遍下降,甚至不少考试得高分的学生,词汇贫乏,语言枯燥,不要说

古体诗词,就连现代文也写不好。有学生坦言:他们并未从古典文学中学到任何实用的东西,比如说,写作能力。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中文系设立古典文学这门课程甚至作为主干课程的实际意义。难道学生花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诵读那么多名篇,竟成了毫无用处的“绣花枕头”?分析作家,解读作品,就仅仅是为了了解作家的思想,或提高鉴赏能力,最后成为眼高手低、夸夸其谈的无用书生?有人也许会认为,古典文学这门课程本身就不是实用性的课程,它的主要任务不过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并对学生的个人气质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仅将古典文学的教学定位在素质或气质培养,是否有些片面?在学生自费上学、自谋职业的今天,花费两年时间来学习的一门主干课程,目的只是培养一种素质,从投资者的角度说,是否属于奢侈或浪费?我们现代的高等教育,已非少数人享受的贵族教育,而是近乎技能培养的专业教育,尤其是本科阶段,除了极少数阳春白雪的专业如哲学等,都是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主,中文系也不例外。这就是现实。如果我们的主干课程如古典文学不正视这一现实,革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岂不是误人子弟?

误区之三:培养目标脱离社会需要。古典文学的教学之所以走入以上误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文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错误。文革以前甚至文革之后的一段时期,综合大学中文系大都将自己的培养目标定位在理论宣传、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这种定位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用人制度的改革,其问题就日渐明显。社会需要不了那么多从事理论宣传的文学批评家,而随着学位制度的建立,本科生几乎不可能进入高校和学术机构。据笔者调查,自从取消国家统分,由学生自主择业之后,综合大学中文毕业生的去向,大都是党政机关、报纸电视、银行、电信、民航以及各类公司。中文虽说是“万金油”专业,但用人单位看重而且需要的,主要还是中文系学生的语言和笔头的表达能力。简单地说,人家聘用中文人才,是要你会写各类文章,尤其是实用性极强的文章,而不是创作小说诗歌,或写文学评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按照目前的培养模式,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古典文学本来就注重文学或文章的实用功能,很多散文名篇,在当时就是应用文,但在我们的教学中,却偏偏要一味灌输“纯文学”的观念,贬低文学的实用功能,好像文学应该是“无用之学”,是“贵族之学”。我这里丝毫没有否定或贬低“纯文学”的意思,而是说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中文人才,应该将文学素质和实用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中外高校的母语系,主要培养的是政界、军界、学界、商界、新闻界以及社会各界需要的高级文才,而非从事“纯文学”创作的诗人作家或文学批评家。诗人作家不可能由高校批量生产,社会也不需要那么多文学批评家。至于培养学术方面的高精尖人才,那应该是硕士甚至博士教育的任务。正是因为我们的培养目标定位与实际需要严重脱节,才使不少中文毕业生有“学非所用”的感叹。

我认为,高校中文系应该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要求,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对人才培养目标作一次重新定位。我赞成这样的看法:高校应该与社会保持距离,不应该被动地应付社会需求,而牺牲学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从长远的观点看,将高等教育完全等同于职业教育,无论对高校,还是对社会,都是得不偿失。但另一方面,高校的教学与社会需要的距离应该适当,不即不离,如果距离太远,某学科某专业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大面积找不到出路,或学非所用,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就不能不对该学科该专业的存在价值,至少是本科层次的存在价值,表示怀疑。我们面对的大多数学生是普通百姓、工薪阶层的子弟,他们是要通过本科四年的学习,获得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本领,改变或提高自己和家庭的生存环境。即使在欧美国家,大多数学生要求于高等教育的,也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时,与一位美国朋友谈及高等教育,他就说,像哲学、比较文学这样不切实用的专业,只有不愁衣食而追求兴趣至上的富家子弟才能选修。话题再回到中文系,现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不需要中文人才,根据笔者供职的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的统计显示,是求大于供;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计显示,中文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在文科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

很多理工专业。如果考虑到中文专业的招生人数,如四川大学中文系近年都在100人以上,四川师大文学院竟在500人以上,而许多文理工科专业仅数十人,那么中文人才的供求比名次还要大大提前。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中文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定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明显滞后,与社会对中文人才的需要严重脱节,是否应该来一次革新?

古典文学是否具有实用的功能?换言之,古典文学的教学是否可以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我的看法是肯定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与今天流行的“纯文学”观念是不大相同的。即使在西方,“纯文学”也只是文学观念的一种。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曾从形式的角度来探讨所谓“文学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非因为其是否出自虚构或想象,而取决于其表现形式是否具有“文学性”。我们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基本上是小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纯文学”,但还有许多并非出自虚构的著述,甚至是实用性极强的应用文,也同样被视为文学,如林肯、丘吉尔的演说,培根的论文和蒙田的随笔,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等。这与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不谋而合。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名篇在当时是应用文,许多被我们今天视为大文学家者,如唐宋八大家,其实当时都是写应用文的高手。古人所谓“文学”,主要是以语言或文笔是否具有文采为标准判断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文”就是文采。我个人认为,这是对文学本质最好的表述。如果我们不是从某家某派的观念出发,而是从古今中外文学史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在所谓“纯文学”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文学天地。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一种表达的艺术。古人学为文章,主要就是学习语言的艺术,表达的艺术。过去被称为“文章之学”或“词章之学”。文章之学或词章之学,不仅是一门可以经过学习掌握的技艺,而且也是为古今社会广泛需要的实用技能。社会要求于中文人才的,也是能够熟练掌握这门技能的文才。上至国家机关,下至普通公司,甚至新闻、文化等事业单位,需要的是“大手笔”或“笔杆子”,而不是富于幻想、多情善感的艺术家。而

我们现在高校的中文教学,恰恰贬低古典文学的实用功能,忽略写作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将古典文学讲成一门或空洞或花哨不切实用的课程,还美其名曰:培养素质,陶冶性情。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纯文学”或素质培养性情陶冶的意思,而是认为,古典文学的教学,既要务虚,更要务实,以培养学生的气质、情趣、谈吐与文笔为主要目标,让学生多读细读文学名篇名著,从中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古典文学的魅力,并辅以背诵与模拟练习,将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进而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即能以优美的文笔撰写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学术文和美文。至于文学发展史一类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作初步了解即可。作为本科教学层次,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实际工作,是否有必要对一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从头至尾,面面俱到地走一遍,为那些无谓甚至无聊的文学争论或文学流派浪费精神,我看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我们对古典文学的价值应该有客观估价。我认为,古典文学之在今天的价值,主要在于其艺术表现形式,包括语言之华美、词汇之富赡,而非其思想内容。就说语言词汇,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施蛰存先生就提倡文学青年读《庄子》和《文选》,理由是从中可以学到许多词藻。虽然鲁迅曾冷言相讥,但在这个问题上,施蛰存的意见是正确的。鲁迅杂文的语言魅力,在相当程度上,难道不是得益于他对古典文学语言出神入化的运用?读今日许多文章,词汇贫乏,质木无文,淡乎寡味,难道不是因为作者古典文学根底太浅?刘心武曾劝告文学青年熟读《古文观止》,其中一条理由,也是扩大词汇。古典文学的词藻以及艺术表现形式,这也许被许多人视为雕虫小技,不足学,其实这正是古典文学的精华所在。至于思想内容,倒真是无甚可取。秦汉文章、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真正思想深刻见解超群能给今人以启迪者以震撼者,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不明乎此,而将教学重心放在什么“史”呀“论”呀方面,听起来热闹,看起来深刻,其实是舍本逐末,误人子弟。中文专业学生的看家本领,从虚的方面说,是人文智慧高雅气质;从实的方面说,就是融会贯通古今文学语言而形成的写作能力。

也许有人会认为,写作能力的培养是写作课的任务。我始终不明白高校中文系在设置课程时,为何非要将写作与文学截然分开,而且还要独立成为一门“学”,即所谓“写作学”。笔者曾经作过调查,学生普遍反应,除了一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教条,大学写作课所讲内容,基本上是重复中学语文课所讲的一般写作知识。这不能怪教师,因为写作的一般知识就那么些,基本训练就那么些,东拼西凑、生搬硬套的这样理论那样教条,实在很难支撑写作成为“学”。如果将写作视为一种技能训练,其秘诀不过是多读多写,读写结合。离开文学空谈写作技巧或技能,如何可能?事实上,即使是高校教写作的教师,也很少有人去研究什么“写作学”,他们的研究领域还是古今中外的文学。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将写作与文学课合为一体?例如,古典文学教学中,可以尝试进行各种文体的模拟练习,文学写作也罢,应用写作也罢,都可以与名篇阅读有机地结合起来。过去一些有影响的古典文学权威选本,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编者当时的意图,并非供学术研究使用,而是供初学者练习写作的范本。传统的古典人文教育,虽然有许多弊病,但至少培养文章写作技能这一方面,还是非常成功的。现代高校中文系的教学,当然要融会新知,贯通中西,但前人成功的经验还是应该继承。中文系本科阶段主要的任务,既然是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较强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我们为什么不用心去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而要学究式地去探讨古典文学的这规律那理论,造就一批批无用之材。每当看见一篇篇文笔拙劣、语言花哨、内容浅薄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我就有一种负罪感: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能具有竞争力?而当今许多写文章的高手,作家更不用说,竟非中文系科班出身,这难道不是高等人文教育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就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几十年一贯制的中文教学模式,过分偏重理论,忽视了将文学与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也注意训练提高他们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从而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复合型人才。

On Mismanagement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eaching by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XIE Qian

(Chinese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Soviet Union's teaching model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China's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stresses ideology instillation and theory explanation, but despises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cultural qualities and practical skills, which results in false, big and empty styles of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breaks away from modern society's actu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personnel. It must be reformed in its teaching idea, content, model and goal.

Key words: classical literature;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practical skills

[责任编辑:李大明]

● 文史札记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印主辨误一则

谢 晖

沈津教授的力作《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已于1999年2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书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南宋至明末之中文善本书凡1433种,以书志形式予以著录,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藏书借此可窥全貌,沈氏之功当不朽矣。然美玉亦有瑕疵,兹举一例,以求教于方家。

该书丛部收有明刻本《闲情小品》一书,书志尾沈氏写道:“钤印有‘国桢藏书’、‘面城精舍’。国桢,为谢国桢。面城精舍为曾钊之室名。”按曾钊(1793—1854)字勉士,广东南海人。曾任清合浦教谕、钦州学正之职,后出任广州学海学堂学长。生平好读书,藏书数万卷,藏书楼取名面城楼,又名古输廖山馆。曾氏面城楼藏书现藏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及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书收藏印章凡四,即“面城楼藏书印”、“曾钊之印”、“勉士校本”、“勉士”,尤常用“面城楼藏书印”及“曾钊之印”两方阳文篆书朱印,未尝见曾氏藏书用“面城精舍”之印者,可见“面城精舍”之印并非曾钊之印,且曾钊室名亦并非“面城精舍”。检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得知,“面城精舍”乃清末民初学者罗振玉之室名。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浙江上虞人,生平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佚书等考古资料,是近现代大文献学家。振玉家中藏书丰富,仅藏书处就达15个,“面城精舍”即罗三藏书室名之一。